

第 一 编

解放前的北京中小学教育

第一章 解放前的北京中小学教育

北京是享誉世界的文化古都。自元朝定都北京以来的七百余年中，除明朝洪武年间及 1928 年至 1948 年这段时间外 北京一直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教育中心，还是五四运动、“一二·九”等爱国民主运动的发源地。

解放前的北京中小学教育，一方面曾经受到进步因素的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在反动政权的控制下 是为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反动政权服务的。

新中国的北京中小学教育是在解放前北京中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开始探究新中国北京中小学教育之前，有必要对解放前北京的中小学教育予以概要回顾。

第一节 北京近代中小学教育的发端和体系的建立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积累了极为丰富而精粹的如《学记》那样的教育理论，并出现了如孔子那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大师。

晚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农民战争的打击，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统治力量大为削弱。在“自强”、“求富”口号下以挽救清朝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中，清廷出于外语人才的急需，于 1862 年在北京建立了京师同文馆。它初设英文馆，学生 10 人，都是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挑选的八旗子弟。随后增

设法文馆、俄文馆、天文算学馆、德文馆，开设了不少自然科学实用技术的学科。京师同文馆由最初的初级外国语学校发展成为具有中学或中等专科性质的学校。京师同文馆是我国最早采用班级授课制的学校，被视为中国 and 北京近代教育的发端（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建立于1898年戊戌变法中的京师大学堂）。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的二十来年间，清政府只允许外国人在首都以外的沿海地区办学；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解除了外国人在北京办学的禁令，于是在北京的外国教会率先创办了一批近代中小学校。1864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Henry Blodget）在灯市口设立育英学堂（现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前身）。同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为纪念裨治文（E.C. Bridgman）在灯市口设立北京市第一所女子中学——贝满女学堂（现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前身）。1865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捐资在东城总布胡同设立崇实馆，后在安定门内大三条建新校舍（现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前身）。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设立小学校，后扩建为潞河书院（现北京市潞河中学前身）。1870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设崇慈女子小学堂（现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学前身）。1871年，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在崇文门附近设立蒙学馆，后改为怀里书院、汇文书院（现北京市汇文中学前身）；1872年，又在崇文门孝顺胡同设立女子小学堂，后改为慕贞书院（现北京市第一二五中学前身）。1874年，英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教士史嘉乐（Scott, Charles Perry）设立崇德学堂（现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前身）。1901年，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宣武门内承恩寺设立笃志女子小学堂（现北京市第一五八中学前身）等等。这些中小学校的创办者旨在使中国“教会化”，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教会

学校传授了西方的近代科学，传入了近代学校的一些教学制度和管理方法。1925年中国政府规定，教会学校“校长须为中国入”；不得以传教为宗旨”。此后教会拨给学校的经费日减，对办学的影响也逐步缩小。

在北京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官立和私立的近代中小学，产生于戊戌变法之际。1898年，北京在建立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建立了附属于京师大学堂的小学堂，学生额数80名，皆为大员子弟，是北京最早出现的近代小学校。同年，四川京官内阁候补侍读杨锐等呈请于京师设立蜀官学堂，专教京员子弟及留京举贡生监，光绪帝传旨嘉奖。四川同乡京官随即在顺治门外设立四川公立中学堂，是为北京最先由本国私人设立的近代中学。^①

清王朝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从1901年起开始实行一些“新政”。改革教育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01年9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当年11月，清政府即在北京琉璃厂设立五城学堂（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是为我国第一所官立的近代中学。1902年2月清政府命令八旗等官学改设小学堂、中学堂，均归入京师大学堂办理。

1902年8月，清政府公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这个学制虽未实行，但北京还是据此开办了一批新学。1902年在郎家胡同经正书院创立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现北京市第一中学前身）。1903年4月部分清宗室学、觉罗学和八旗官学改建了6所新式高等小学堂，同时又新设两所贵胄新式高等小学堂。这8所小学堂定为京师大学堂

^①清末称私人共同集资或社会团体开办的学校为“公立学校”。据《中国教育管理史》第24页，海潮出版社，1995。

附属 统归管学大臣督率办理。同年 顺天府在地安门外兵将局设立顺天中学堂 开设 5 所私立女子小学 因无人入学而停办)

1904 年 1 月 清政府公布以“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为指导思想、以日本学制为蓝本的《奏定学堂章程》即“ 癸卯学制 ”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实行的学制。“ 癸卯学制 ”颁布后，京师旧学依制陆续改为新学 并劝办、督办新学 以为全国示范。此后 八旗督统衙门、内务府等大量设立小学堂。1906 年以后，公私立学堂都大批兴办起来 中学、小学、师范学校、艺徒学堂、农业学堂、商务学堂、医学堂、法政学堂、女学、教育研究会等都相继建立。1906 年 2 月，慈禧太后面谕学部，振兴女学。3 月 学部颁布教育宗旨 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4 月，四川同乡会在宣武门外设立四川女学堂。5 月，京师大学堂奉学部令调查京城、直隶等处所设中、小、蒙各学堂 计八旗满汉 中、小、蒙学堂共 135 所 外有女学堂 25 所。7 月，学部在安定门内设京师第一初级师范学院 1912 年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是为北京师范教育之始。9 月，江亢虎在绳匠胡同设立外城女学传习所，是为北京首所女子师范学校。同月，陈宝泉联合同志设立普通教育研究会，呈准京师督学局立案，是为北京地方教育研究会之始。1906 年，清政府拟定八旗改良办法，其中规定：八旗幼丁凡年及九龄者，一律送入小学堂肄业，违者罪其家长。同年 11 月 顺天府尹凌福彭归并原东、西、南三路顺天中学堂之学生及经费，于西什库天财库旧址设立顺天中学堂 (现北京市第四中学前身)，生源来自所辖 24 县 每县选派学生两名来京学习 原设于兵将局的顺天中学堂改为顺天高等学堂。

1908 年，京师劝学所成立后，大批私塾改为私立小学堂。

1910 年，八旗学务处设左翼八旗中学堂 (现北京第二中学前身) 和右翼八旗中学堂 (现北京第三中学前身)。据 1910 年 5 月学部教育统报表，京师已有学堂 206 所 在校生 11 417 人。至此，

北京近代中小学教育体系已基本形成。

北京现今历史悠久、成效显著的知名中小学校，此前大都已经建立。

第二节 北京北平中小学 教育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八旗中小学堂改为公立学校，取消八旗名称及其特权，五旗（汉、满、蒙、回、藏）皆可入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复古教育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抨击，强烈要求民主、科学的教育。军阀割据、混战、政治混乱的局面，在客观上也给予了教育工作者较大的活动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四运动前后和 20 年代，北京和全国教育界出现了教育思想活跃、教育社团林立、教育改革试验纷呈的新教育运动。究其要者有：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以及共产主义者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等等。北京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也更为迅速。30 年代中期，北平市大力推进义务教育，使学龄儿童入学率上升至 50%。

二三十年代北京（北平）的现代中小学教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解放前最好的水平。据社会局 1936 年 10 月公布的统计数字，北平有市立中学 10 所，私立中学 65 所。^①至 1937 年 6 月，北平共有国立小学 2 所，铁路小学 3 所，市立小学 69 所，私立小学 110 所，简易小学 75 所，短期小学 199 所。^②

这些学校中，多数水平不高，小学中有不少属于一、二年制

《北京近代教育记事》第 294 页，北京教育出版社，1991。

② 《北京近代小学教育史料（下册）》第 876—910 页，北京出版社。

的简易小学 中学中还有一批可以交学费、混文凭的“学店”。但是，在二三十年代北京（北平）的确也涌现了一批成效卓著的名校、名师，如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附属女子中学、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冀高）、北京市立第四中学和第一女子中学、北京私立育英中学、贝满女子中学、汇文中学、潞河中学、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现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和第二附属小学（现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现北京市宏庙小学）、北京市香山慈幼院、北京市史家胡同小学等等，都是当时国内知名的一流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有林砺儒等一批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热心教育、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的校长，长期主持校务。这些学校择师较严，重金礼聘，有一代名师活跃在教坛。例如：语文教师石评梅、张寿康，数学教师傅种荪、马文元、王光兆、李观博、孙梅生、韩桂丛（韩满庐）、王明夏、杨仲兰、董延闾，理化教师李直钧、刘景昆、张子锷，史地教师徐楚波、贾善长，英语教师赵德先（赵圃荪）以及小学教师陶淑范、王企贤等等。当年诸多文化名流曾在北京中小学任职或兼课。其中有：蔡元培（曾任北平孔德中学校长）、胡适（曾在艺文中学搞道尔顿制试验）、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闻一多（1926年建立爱国中学，任董事）、老舍、焦菊隐、陈宝泉、黄庐隐等。邓颖超曾于1920年至1921年在京师大学堂附属小学（现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任教。^①

这些名校名师为培育一批杰出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如冯至（四中）、钱学森（师大附中）、杨振宁（崇德中学）、邓稼先（崇德中学）、李德伋（师大附中）、钱三强（孔德中学）等，都是二三十年代在北京（北平）接受中小学教育的。

二三十年代北京（北平）的一些中学进步师生积极投入了当

^① 《北京普通教育志》（上卷 第 353 页，北京出版社，1998。

时的爱国民主革命运动。在北京师大附中就读时的赵世炎即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员。“一二·九”运动中该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多达 70 多人，以后成长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骨干，如：刘仁、郑天翔、刘导生、张承先、张文松、李琦等。汇文中学于 1926 年 11 月即成立了以彭雪枫为负责人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地下）。

当然，从根本性质上说，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北平）中小学教育，是受北洋军阀、南京国民政府和外国教会势力所控制，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广大劳动人民子女基本上被排斥在外。此外，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北平）中小学教育还有以下的严重缺欠。

1. 教育经费不足。

清末贵胄学校的经费比较充足。但自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中央政府迁至南京以后，北平中小学的经费日益短缺，致使北平没有什么合乎规范的中小学校舍，一般中小学教师工资相对更低。据 1926 年第 25 期《新教育评论》发表的调查材料，北京市小学教师当年 3 月份至 7 月份薪俸为：3 月，12 元；4 月，12 元；5 月，15 元；6 月，24 元；7 月，15 元。作者指出：“这样的收入，个人生计已嫌不足，倘若一家再有数口，又无其他收入，怎样生活呢？”这一时期，欠薪、索薪、为索薪、增薪而“请假”罢教、校长、教育局长为经费无着而辞职的记载比比皆是。^①

2. 办学水平相差悬殊。

一部分学校办得相当好，但是许多学校办得很差。1936 年 8 月 15 日，北平市社会局取缔会考成绩不良的学校，私立豫章中学因无一人各科全部及格，撤销立案；光华女中和精业中学分别受到警告。^②

（北京近代教育记事》第 120—274 页，北京教育出版社，1991。

② 同上书，第 293 页。

3. 随着南京政府 1928 年底统一中国（尽管主要是在形式上），^① 对教育的统治逐渐加强，教育思想趋向僵化。

1922 年 北京政府虽然颁布了“壬戌学制”制定了中小学的课程标准，但在当时各种教育改革思潮的激励下，一些办学水平较高的学校都有自己的办学思想、风格和做法，而北京政府及初期的南京政府都无力过多干预。北师大附中、北京四中、辅仁附中等公、私立中学除党义、军训二科外，其他科目各学年、各学科每周授课时数和内容都不尽相同。至 1932 年 教育部修订高、初级课程标准，经北平特别市社会局转发各校执行，教育界活跃的教育思想和纷呈的办学风格就逐渐被统一的要求代替了。

第三节 解放前中小学教育的衰败

一、日伪统治对中小学教育的严重摧残

1937 年夏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 许多学校解散、停办或难以开学。至 9 月 6 日仅有 30 所小学开学上课；中学生减少至 12 526 人 较“七七”事变前锐减近一半。^②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封闭了英美教会学校 改为“市立”。日伪在中小学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通过改订课程 增加读“经”改编教材 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一律必修日语等手段严格控制教学内容，理科程度降低，文科贯彻“中日亲善”的奴化思想。日寇每攻陷中国一个重要城市即强迫师生参加“庆祝陷落”游行。频繁开展以反

^① 1928 年 12 月 29 日，张学良“东北易帜”标志国民党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

^② 本节所引数据 除特别注明者外 均据《北京普通教育志稿》（上卷 第 139 页、第 189 页 北京出版社，1989）。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为目的和内容的“治安强化运动”来维持殖民统治。组织无偿奴役劳动的“勤劳奉仕”强迫大、中、小学学生参加。许多学校派驻日本教官，监督奴化教育的实施。

至1944年北平有“市立”中学17所，私立中学31所；市立“小学86所，私立小学78所，简易小学79所。中学较“七七”事变前减少20余所，小学较“七七”事变前减少的校数就更多。

日伪统治时期，许多教师离开了学校。在校教师生活十分困苦。教师为反抗日伪奴役，普遍怠工。1944年、1945年间伪北平特别市教育局多次训令中小学，严禁教员怠工，飭令中小学校厉行教职员考勤制度，任何人不得迟到早退，但收效甚微。

二、解放前夕残败的北京中小学教育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平津特派员办公处接收了城北5所日本国民小学等学校，其余14所日本学校和市立中小学由北平特别市教育局接收。英美教会学校恢复私立。1946年9月市立小学212所改称国民小学，其中规模较大、校址适中的16校定为中心国民小学，每区一所。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反动势力极力控制中小学校，迫害进步师生，以加强其法西斯统治。

随着物价飞涨，学费和书价日趋高昂，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一次次限定学校收费标准。1945年11月，市教育局曾规定私立中小学所收学杂费不得逾市立中小学一倍。

为物价飞涨所迫，1947年10月24日北平市中小学教职员代表向市政府请愿，要求调整待遇，配发实物。请愿未能如愿，于是全体中小学教职工“请假”（实为罢教），市教育局局长王季高为此请求辞职。1948年10月20日北平市全体国民小学教职员为排队抢购油粮，总“请假”4天。市立中学教员亦于27日起总“请假”4天。11月1日小学教员再“请假”一周，市立

中学教员“续假”3天。当时北平大多数中小学校舍残破不堪，教学设施极其简陋。北平解放前夕，许多学校被国民党政府或军队占用，课桌椅等设施被砸烂当柴烧。至此，北平市中小学已无法维持，相继停课，等待解放。

据统计，1948年10月，北平有市立中学12所，私立中学54所，中学在校生44229人，小学356所，小学在校生116325人。^①失学儿童约占学龄儿童总数之半。^②

许多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历经艰难，在十分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工作，为北平中小学保留了一批教学骨干和一些学校的优良传统校风。

许多进步师生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和人民教育工作者联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护校斗争，迎接北平中小学教育的新生。

北京是一个文化古都，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发源地，是旧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抗日战争前，北京教育界拥有一批国内一流的文化名家。这些人不仅从事高等教育，而且其中不少人还创办普通学校，研究普通教育，开展教改试验，因而当时北京市不仅拥有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而且普通教育中也出现了一批名校、名师。虽然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教育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8年的摧残；抗日战争结束后又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3年统治，学校办学经费严重短缺，教育工作者生活十分困苦，许多学校残破不堪；但是北平的中小学教育毕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有一批名校仍然保留了下来，且依旧拥有一批名师。这些学校，在北平解放之后，大体上都成了北京中小学的重

① 《北京市教育概况》北京市教育局办公室 1949年档案。

② 《1949年小学教育工作总结》，北京市教育局小教科档案。

点学校；这些教师，都成了北京市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骨干力量。

当然，从总的方面看，由于旧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所以北平解放时，旧北平政府留下的有形的教育资源是极其有限的。当时许多中小学都很残破，学校设备十分简陋，教育质量也很低。但是，北京（北平）是五四运动及其后反帝反封建、民主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基地，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是旧北京（北平）市留给新中国最宝贵的无形的教育资源。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里，五四运动民主、科学的伟大旗帜一直在北平教育界飘扬。“一二·九”、“抗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爱国学生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一直是团结广大学校师生的强大力量。北平解放时不仅高等学校中有较强的党的地下组织，而且多数中学也有中共的地下党员，至于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革命师生就更多了。北平解放后，中小学校广大师生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中小学教育顺利接管改造，都是与北平教育界历史上存在着反帝、反封建、民主、爱国的优良传统分不开的。这个优良传统对解放后的北京普教工作端正办学方向和提高教育质量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较为具体地表明二三十年代北京（北平）普通教育所达到的程度，特简要介绍几所中小学的情况。

附录 1

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师大附中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始创于 1901 年，称五城学堂。1902 年依“壬寅学制”更名五城中学堂。1908 年改为北京优级师范学堂附属中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 年改称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后随北京师范大学命名。

北京师大附中历任主任（实际主持校务，校长系由师大校长兼任）多为教育界知名人士。著名教育家林砺儒（后曾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自 1922 年至 1930 年任主任，建树卓著。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师大附中已蜚声全国。

1922 年该校为实施高、初中各为三年制的“三、三制”所订的《学则》中确定该校的宗旨是“实施中等教育 兼供师范大学实习研究”。其要点为：“1. 增进身体健康；2. 培养基础知能；3. 培养高尚品格；4. 预备升学并培养职业能力；5. 养成良善公民及家庭健全分子；6. 养成善用余暇之习惯；7. 实验中学教学新法。”根据这一宗旨 该校积极探求理想的教育方法。

北京师大附中率先在中学普及体育，创立课间操制度，并限定从优良学生中培养体育选手。自 1909 年至 1930 年 3 次实行文理分科试验 试行学分制。首行“三、三”制时，一切规章制度、课程、教材都是该校自己草拟 自己试行 自己修订。在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流行期间，该校始终重视给学生以系统的科学知识，如高二开设第二外国语，数学开设微积分初步，物理开

设初等力学、电磁学，化学开设分析化学等。1923年至1929年就读于该校的钱学森于1991年说他在师大附中“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国现在大学二年级的程度了”。该校课外活动也极为丰富活跃。

二三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集聚了一代名师，如中文教师林琴南（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所选教材当时定为全国范本）、音乐教师冯亚雄（为当时国歌谱曲的作者）。此外，一大批著名学者，如鲁迅、钱玄同、石评梅、黄庐隐、傅种荪、杨秀峰等都曾在该校任教。

这一时期，师大附中毕业生中成长了一大批卓越人才。如科技界的钱学森、张维、梁守槃、马大猷、林家翘，社会科学界的张岱年，文艺界的李德伦、于是之、赵荣琛等等。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有30人是师大附中的毕业生。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还是一所具有民主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五四运动中，当时在校就读的赵世炎即为积极参加者，后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员。该校师生积极投入“一二·九”运动，党所领导的“民先”（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多达七十余人，成长了一大批无产阶级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骨干。

附录 2

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市立第四中学

北京市立第四中学始建于 1906 年 是为顺天府立的“顺天中学堂”。顺天府所辖 24 县各派遣两名学生入校学习。 1912 年 9 月 29 日改称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当时该校“以实施中等教育，预备升学实力兼培养职业能力为宗旨”。

1926 年 高中实行文、理科分班 至 1928 年过渡完六年制（三、三制）参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 四中制定了本校的课程表（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各科教学大纲）。现摘要列举四中 1930 年前后初、高中课程如下。

初中部课程 党义、国文、算学、外国语（每周 7 课时）历史、地理、生理卫生、物理、化学、博物、手工、图画、体育、音乐、商业常识（初三开 每周 1 课时）总计 183 学分 每周上课 29—31 课时。

高中部甲组（文科）课程 党义、国文、外国文（每周 7 课时）数学（高等几何、高等代数、三角）文化史、文学源流、中文法、近世史、地理通论、生物学、伦理学、心理学、修辞学、文学概论、文字学、学术文、科学概论、人生哲学、军事训练。以上为必修课，共计 163 学分。选修课为 第二外国语（德文、法文、日文）法学通论、经济学大意、新闻学、哲学概论、教育学 每科均为 2 学分。必修科及选修科合计满 180 学分者始准毕业。

高中部乙组（理科）课程 党义、国文、外国文（一年级 7 课时，二、三年级 5 课时）数学（高等几何、三角、解析几何、高等代数）理化（物理、力学、化学、磁电学）物理试验、化学试验、文化

史、近世史、地理通论、社会学、科学概论、生物学、用器画、军事训练。以上为必修课，共计 166 学分。选修课为：第二外国语（德文、法文、日文）经济学大意、近世几何、微积分、热学、地质学 每科均为 2 学分。必修科及选修科共满 180 学分者始准毕业。

李直钧^① 在《四中前期杂忆》一文中介绍：“四中是有名的中学 众望所归 取法乎上 以北大、清华为目标。”四中的数、理、化、生各科教学 多用外国原本 学生的外语程度因而较高。”“马文元讲大代数，不但使用外国课本，而且参以大英百科全书。”刘景昆讲化学做实验 深入浅出 有条不紊 学生听后就基本记住了 几乎不用复习。”我 李直钧 讲物理虽然水平不高，能随时带领同学深入实际 到各厂矿、企业、学校访问 使学生增广见闻 增进实际经验。”这是养成学生勤奋朴实的学风的重要原因。、^②

北京四中不仅具有很高的教学水平，而且在品德教育、体育、美育、科技教育方面也卓有成效。该校设有体育部、音乐会、国乐团、科学研究会、读书协作社、国画研究会等社团组织 学生自愿参加，自己组织管理，在北京市和全国的活动中多次取得优异成绩。

北京四中拟定有详备的规章制度，包括操行成绩考查规则，学业成绩考查规则，实验规则，请假规则，教室规则，操场规则，图书馆规则 阅览室规则 宿舍规则 招生规则 以及各项办事细则。

当年教育部和京师学务局在对四中的视学报告中盛赞该校

李直钧，四中早年毕业生，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长期在四中任教，后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② 《北京四中建校八十周年纪念册》第 11 页。